

革命
文丛

我问故我在

杨
澜

学林出版社

革命文丛

杨澜

我问故我在

杨澜访谈录

学林出版社

笔会文丛

我问故我在

——杨澜访谈录

杨 澜

主 编	萧关鸿 曹维劲
责任编辑	林震浩
特约编辑	桂国强
封面设计	陶雪华
版式设计	应黎声
出 版	学林出版社 上海市钦州南路 81 号 3 楼
发 行	新华书店上海发行所
印 刷	上海师大印刷厂
版 次	1999 年 1 月第 1 版第 1 次印刷
开 本	850×1168 1/32
印 张	15
字 数	32 万
插 页	5
印 数	50 000 册
书 号	ISBN 7-80616-620-3/I·217
定 价	24.50 元



序

教授从兜里掏出一张一美元的钞票，高高举起，涨红了脸，大声说：“谁能提出一个问题，任何问题，我就奖给他一美元。”

他是美国人，在北京外国语大学任教。他讲的是历史与宗教，他讲完了，问大家有什么问题。谁也不吱声。他请求大家提问，因为不然的话他无法了解我们听懂了多少。但还是没人举手。教授有点儿不耐烦了。不，应该说，他愤怒了。他认为这是中国学生对他的不尊重。

“没有哪一种知识是提不出问题的。难道我讲的每一句话都无懈可击吗？是你们压根儿没听课还是愚不可及？”他的另一只拳头敲打着桌面。

课堂的空气很紧张，学生们被吓坏了。我们从幼儿园开始就被训练着双手背后，认真听讲，长大后开始记笔记。谁记得全，背得好，考试就能拿高分。提问的通常是老师。他期待学生们还给他曾授予学生的正确答案。是的，中国的学生，起码我们这一拨人，在十几年严格的教育中学会了如何对付老师的提问。可我们自己不习惯提问，更不被许可反问，那样是有悖师生之道的。所以，在美国教授晃动的一美元下，我们有点儿不知所措。

终于，有几个学生举手了。我是其中之一。与其说我

们真的有什么问题要问,不如说是因为我们也有点儿生气,因为那一美元有点侮辱人。我们提出了问题,问了些什么似乎并不重要,要紧的是提问本身。没有人要那一美元。下课的时候,教授的脸色好看了一些,而我们也糊里糊涂地昂着头,盘点着靠提问赢得的一点儿民族自尊心。

那是十年前的事了。我上大学二年级的时候。

现在我已非常习惯于提问了。实际上,我已经以提问为生。说得通俗点儿,我靠提问吃饭。我是记者。

我甚至认为,人生本身就是一场问答。有一个问题人人都必须面对:“你为什么活着,又将怎样活着?”每个人的生活本身,就在回答这个问题,不管你有没有意识到。上帝是宽容的老师,五花八门的答案他都照收不误。至于给各人打多少分,就不得而知了。

如今,我正用年轻的生命,一天又一天地写我自己的答卷,这份答卷是由无数细节组成的。其中有不少时候我感到困惑难解或绝望无助,或干脆就答得跑了题。好在上帝给我们安排的这场考试是开卷的,你可以去问别人是怎么回答的。

《杨澜工作室》就是一个可以公开讨论答案的地方。有不明白的,我问,以求明白;有时明白了,还要明知故问,因为我估计电视机前的有些人也想明白。

我想明白金庸笔下可歌可泣的侠义精神在他自己的人生中是否行得通;我想明白建筑大师贝聿铭信不信风水;我想明白世界信息产业巨子安德鲁·格罗夫怎样从一文不名的匈牙利难民开始,到今天领导科技产业的发展潮流;我想明白,在一代伟人邓小平三起三落的政治生涯中,他的家人接受了怎样的考验;我还想明白,香港女探险家李乐诗心中

的南极与北极,“饺子皇后”臧健和所经历的辛酸与挫折……

他们中的大多数人已经用大半生的时间写出了自己的人生答卷,有辉煌的篇章,也有痛苦的教训。当他们回答我的提问,展示他们人生的荣辱成败时,生活的意义似乎变得清晰起来了,不同的人可以从中得到不同的启示。

当然,《杨澜工作室》并不是专门讨论人生经历的地方。我们每一天都会面临一些具体的问题。比如,沈阳的工人在大批下岗。作为他们的市长,慕绥新如何树立市民对政府的信心?中国对外贸易经济合作部部长石广生能不能完成对朱镕基总理立下的军令状?台湾与香港两大著名电影奖的组织者李佑宁、吴思远面对日益冷落的门庭作何感想?

有时候,我的提问也可能进入“旁门左道”。

1998年5月,《杨澜工作室》播出了对同性恋者的访问;10月,又播出了对变性人金星的访问。有朋友打电话给我说:“干嘛做这种‘边缘人’的选题,难道‘正常人’的话题都谈尽了?”

当然不是。问题是无视他们的存在才是不正常的。我们在排斥这些边缘人的时候,对他们在想什么,为什么会做出这样的选择,果真了解吗?在有着巨大人口基数的中国,如果按国际粗略的计算方法,人口的3%为有同性恋倾向者的话,就意味着中国有三千多万人。这足以组成一个中等国家。再说,什么叫“正常”呢?世界卫生组织都认为同性恋是少数人的自然行为。我们的伦理伴随科学的发展成为一个变数。当这些人坐在镜头前,观众看到的并不是妖魔鬼怪,而是整洁、自尊,也希望得到尊重的人。如果他们

没有伤害别人,我想,我们的社会应该开明到容许他们“正

常”地生活。这应该是人道主义的一部分。

由于我在美国学习、生活过三年的时间,中西文化思想的冲突与交汇也成为我的一个主要兴趣。这一主题在我对前柏克莱大学校长田长霖教授、已故作家王小波之妻李银河、国际影星巩俐、著名导演张艺谋等人的采访中一再出现。张艺谋在接受采访中自嘲地讲起第一次看西洋歌剧的尴尬经历:那次他穿着T恤走进歌剧院,被一律身着夜礼服的观众盯到面红耳赤。而他不久就成为执导经典西洋歌剧的第一个中国人,地点就在中国皇帝祭祖的太庙。他说,他要营造中华帝国的“辉煌”。意大利灯光师说:“已经够辉煌了”,但张艺谋还嫌灯光太诡秘。你看,连这样一种对灯光明暗的感觉,中西方人都存在沟通上的困难,甚至为之争吵,就更别提王小波与之笔战的“中国可以说不”,还有田长霖面对的种族主义者的刺杀威胁。

有感而发,有感而问,是节目走向成功的第一步。凤凰卫视中文台在选题方面给予我相当大的空间。加上我是在同事们收集资料的基础上自己完成采访提纲,直接参与后期编辑,并撰写串联词,这就保证了节目具有统一的风格和鲜明的个性。这样宽松的工作氛围也是凤凰卫视中文台最吸引我的地方。

以上谈了提问的内容,接下来就该谈谈提问的方法了。

我认为提问者的心态尤为关键。人生而平等,是法国启蒙运动思想家在十七世纪广加传播的理念。然而直至今日,等级的观念还是根深蒂固于人类社会。作为一名访谈节目的主持人,提问的对象上至名流显贵,下至平民百姓,你的心态在言谈举止间不经意的流露,根本无法逃过摄像机的镜头和观众的眼睛。一视同仁,不卑不亢,不让自己的

主观态度成为观众与信息之间的屏障,是我对自己的要求。

面对权威人物,提问可以尖锐一点,其实他们也往往期待着某种挑战,即所谓的智力冲击(brain storm)。记得在采访传媒大亨默多克时,我曾问到:“在《007-明日帝国》这部电影中,刻画了一位意欲通过控制各种传媒而控制世界的狂人,不少人认为这是影射你的形象,你有何感想呢?”默多克沉吟一会儿,一贯低沉的语调高扬了起来,说:“没有人有这样的能力控制世界。读者、观众、听众实际上是非常聪明的,人们没那么容易受骗上当。他们有自己的辨别能力和判断能力。”

在采访文化名人余秋雨,谈到新闻媒体上未经核实的小道消息广为流传时,余先生说,这大概是我们的传媒从刻板到言路初开所必然出现的无序现象。

而我则不同意这种观点。无论是在香港、台湾、英国还是美国,假新闻随处可见,并未因为媒体的“开放”而收敛。相反,专登谣言的报刊,无所不在的狗仔队都已是司空见惯的了。

这一反问使余先生有机会进一步阐述他的关于“有序”的看法。他说:“海外和港台报刊上的小道消息确实很多,但它们固守着一个本位:庸俗就是庸俗,连语言都是挤眉弄眼的。不会慷慨激昂地提高到民族大义、文化前途的道德评判上来。这也是一种‘序’。”

“名人”们往往已习惯于媒体采访,也往往善于表达自己,但“小人物”则不同。面对摄像机,他们可能感到陌生甚至紧张,这时的采访者要尽量以接近普通百姓的衣着,用他们生活中的语言去交谈,不要随便打断对方的讲话,充分理解和尊重对方的情感。在《杨澜工作室》采访的人物中,我

个人最受感动的就是一位“普通人”。他叫戴建国，上海人，年近五十，用每月800元的工资支撑着一个五口之家。当年在北大荒插队时，一位农民的女儿爱上了他。在被娘家强行嫁给邻村农民的路上，她精神失常了。而当时的戴建国，面对知青返城的大潮，毅然说：“我不回上海了，我娶她。”他说他一生没有成就什么大事，为生活的重负天天奔忙。然而我却认为他是一位真正的英雄，敢于直面人生，又慷慨地付出温存。在他简陋的斗室中，我与他的一家人聊了很长时间。我小时候也住过低矮阴暗的小阁楼，这使我們有了不少共同语言。戴建国的经历本身就富有传奇色彩，而我的提问就是帮助他回忆。

在采访过程中要做到对来宾一视同仁，采访之前，充分的案头准备是必不可少的。如果说电视访谈节目与平面媒体的记者采访有什么区别，我想很重要的一点就是：对于电视访谈节目来说，过程≈结果。之所以是“≈”，就是因为非现场转播的节目仍有一定的后期剪辑空间；但这个编辑量是很小的，因为我们要保持谈话的自然流畅和宝贵的现场感。通常，制作半个小时的节目，我们的录像时间不会超过40分钟。

如果没有充分的案头准备，提问往往是肤浅的。来宾会认为在同一个小学生讲话，甚至对牛弹琴，谈话的兴趣肯定不高；没有准备的提问也往往是发散型的，东一榔头西一棒子，没有重点。半个小时的采访时间一晃就过，而留给观众的却是一片模糊。

充分的准备工作常常能带来意外收获。在采访建筑大师贝聿铭先生之前，他托人转告说：“什么都可以谈，但不要提香山饭店的事。”香山饭店是他在中国开放后回国设计的

第一个建筑,倾注了大量的心血,但当时国内的施工、管理水平跟不上,以至于肯尼迪夫人等国际要人前来参加开幕典礼的当天,贝先生还要亲自蹲在香山饭店的大厅里铲地上的石灰,而他的夫人则在客房中教服务员如何整理床铺;身着夜礼服的各国嘉宾与蜂抢自助餐的中国来宾混杂在一处……

但我想,香山饭店在贝先生的建筑生涯中是尝试中西风格兼容的重要一笔,不可回避。在我对他的访问进行了一大半时,我还是忍不住试探性地提起了这个话题。在这之前,我们聊建筑风水,聊苏州园林(贝先生的祖籍在苏州,狮子林就曾是贝家园林),聊北京的建筑特色。大概因为我事先有比较充分的准备,贝先生的谈兴也越来越浓,他竟不怀戒心地回忆起当年的这一幕。

文章似山不喜平。充分的准备工作可以使谈话顺畅自如,但还不能保证留下一两处闪光点。我发现,以往采访中的闪光点几乎无一例外地是在直截了当的提问下并发的。

在采访香港编剧、也是同性恋者的林奕华时,我问:“人们普遍把同性恋和艾滋病联系在一起,觉得它肮脏、不健康,你有什么看法?”林奕华说:“大家在互相流传这些资料时,并没有多少人去研究过真正的医学资料……实际上,通过性去传染一种病毒的情况是人类一直都有的现象。”他还激动地说,长期以来,在异性恋的人群中,娼妓、滥交等现象有增无减,是各种性病的传播渠道,也说明道德水准的高低根本无法用异性恋还是同性恋来区分。

在采访沈阳市市长慕绥新时,我一直担心自己提问的结果会招来一套套官话。所幸慕市长是个开朗健谈的人,

而我的问题也是单刀直入的：“沈阳市在1997年推出一百九十多家国营企业，对其产权或经营权进行转让，但只有二十家转让成功，为什么呢？”

慕市长答曰：“目前沈阳80%—85%是公有制经济，只有15%—20%是民营、外资，或其他经济形式。于是国有资产想转让出去，却没有市场空间去接收。……所以我们只有先壮大民营、外资、农村经济，才能逐渐消化和激活国有经济……”

以上涉及的是我在过去的一年中积累的有关提问的点滴经验。我还想说，即使有了好的立意、有了健康的心态、做了充分的案头准备、提问也做到切中要害，仍然无法保证一次访谈的成功。

就像一个农民犁地、播种、杀虫、锄草，可是如果老天不下雨，或者放了洪水下来，照样是颗粒难收。这可遇而不可求的天气就是来宾本人。他（她）本人是否健谈，他（她）那天的情绪如何，都直接影响节目质量。因为我不可能像文字记者那样去理顺、归纳被访者的谈话，我们的谈话过程就是观众将要看到的结果。

我要感谢接受我采访的每一位来宾，他们深刻的见地、丰富的阅历、斐然的成就，常常让我像发现宝藏般欣喜。他们才是《杨澜工作室》真正的主角。在这本书的编辑过程中，他们还寄来自己的照片，并不忘对一些专业术语进行最后审核。

在这里，我还要特别感谢凤凰卫视有限公司董事局主席刘长乐先生，他不仅倡议开设了这个节目，而且一直给予我们中肯的意见；有时为联络嘉宾，他还在繁忙的工作之余帮助我们“公关”。凤凰卫视中文台台长王纪言先生、副台

长关伟先生、节目经理温港成先生、特别顾问曹景行先生，都一直领导和参与节目的创作，在此一并表示感谢。

《杨澜工作室》没有庞大的制作班子。我们总开玩笑说，我们是“三个半”小组：即一位专职导演、一位专职统筹、一位兼职资料员、一位兼职顾问，再加上我这个兼职制片人兼主持人（因为我还主持一周五天的《百年叱咤风云录》）。但这是一个精干的创作集体，而且思路开放。每当我们为一个选题的成功而击掌大笑，或为一次访谈的切入点而争执不下的时候，我们之间的友情和相互尊重就加深了一层。

《杨澜工作室》的前任导演谭浩瀚和现任导演李伟峰都为节目的后期制作及节目形态的不断变化做出了很大的努力和贡献；北京摄制组的导演李平、王志江为前期采访不辞劳苦；王明青、曾展强、陈健丽、颜美玉曾先后负责节目的前期资料整理和来宾的联系工作，他们经常给我很好的建议和看也看不完的资料。我们也因此不仅做了同事而且成了好朋友。

把电视节目还原到文字上是件吃力不讨好的事。没有了人物的表情、手势，没有了辅助画面，把纯口语的东西落在白纸黑字上，会使信息量削减很多。感谢《文汇报》“笔会”版的主编萧关鸿先生和编辑桂国强先生在文字整理方面倾注了大量的心血。现在出现在读者面前的，是从1998年1月3日~10月31日之间，44集《杨澜工作室》中的31集，每篇文字也在保持原味的前提下有过一些润色。在这里，还要特别感谢朱迪云小姐在此书编辑过程中所做的大量而细致的整理工作。

明年，我还将提问下去，并希望在世纪末把眼光投向中

国以外更广阔的空间。我争取问得更好,也渴望得到更好的回答。

我问故我在。

杨 澜

一九九八年十一月十六日

目 录

- 1 序
- 1 华语电影的滑坡——访吴思远、李佑宁
- 13 企业家的取胜之道——访张瑞敏、谭世英
- 27 香港的证券警察——访梁定邦
- 40 潇洒人生——访陈逸飞
- 53 女儿心中的邓小平——访邓林
- 65 疯狂的香港房地产——访施永青
- 79 男人眼中的女人——访蔡澜
- 99 全社会的“希望工程”——访徐永光、方召麟
- 123 与“查大侠”侃大山——访查良镛
- 145 《荆轲刺秦王》及其他——访陈凯歌
- 166 传媒大亨与《泰坦尼克号》……——访默多克、
陈翰如、王健民、黄鲤荔
- 185 基因·克隆·道德——访黄淑帧、曹宏威
- 202 两个女人的故事——访臧健和、叶咏诗
- 218 与同性恋者谈同性恋现象——访林奕华、邵国华
- 235 电脑“首脑”说电脑——访格罗夫
- 252 跨越“三极”的女性——访李乐诗
- 267 建筑与城市——访贝聿铭
- 283 生死两茫茫——访李银河

- 304 回归一年话香江——访张浚生
317 面对亚洲金融危机……——访石广生
328 从真实到有序——访余秋雨
337 敬畏生命——访赵忠祥
349 走出“美国梦”——访田长霖
360 欲说当年好困惑——访史铁生、孙立哲
373 女明星 平常心——访巩俐
386 是是非非马家军——访马俊仁
400 重建信心——访慕绥新
413 太庙前的洋腔洋调——访张艺谋
428 关于古城保护的对话——访阮仪三
442 选择——访金星
455 一个普通人的故事——访戴建国

华语电影的滑坡

访吴思远、李佑宁

1998年1月3日

1997年底在台湾金马奖颁奖典礼上,台湾老导演朱延平说:“10年前,台湾电影年产200部,我只拍5部,获奖机会为1/40。现在,台湾电影年产20部,我还拍5部,获奖机会为1/4。10年以后,若是台湾电影年产5部,我仍拍5部,那就有100%的获奖机会了!”

这话说得幽默,却让人觉得有点心酸。

在香港,电影金像奖颁奖前夕,主办者最担心的就是获奖演员不来领奖。果不其然,几位主要获奖者都在国外,奖杯则由在港演员代领。他们的理由当然是“太忙了”,但香港媒体不无尖刻地说:“如果是奥斯卡颁奖,他们恐怕爬也要爬到领奖台上去。”潜台词就是:这样的一个香港人的电影奖,在这些“国际影星”心中已没有多少分量。

如果要来谈华语电影业的滑坡,香港导演协会主席吴思远及台湾金马奖组委会秘书长李佑宁是很有发言权的。他们两人本身就是从业多年、受人尊敬的导演,吴的代表作《新龙门客栈》及李的《老莫的第二个春天》都是票房和影评俱佳的上乘之作。

他们对于华语电影在香港、台湾等地的滑坡所表示的忧虑是真切的,提供的答案则各有侧重。其中,李导演对现代年轻观众热衷于“有电影感”的电影的分析给我的印象尤